

刘易斯拐点的挑战及对策

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争论了十多年，蔡昉(2005)首次撰文指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将相继出现下降，劳动力短缺不可避免。蔡昉、王美艳(2007)估算了农村劳动力规模、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的劳动力规模、以及现有条件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得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式微的判断。¹王德文(2009)认为由于测定劳动力剩余难以有共识，因此可以结合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²对此，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不同观点，钱文荣、谢长青(2009)指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有种种结构性原因。³王小鲁结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并对数据进行调整后指出，农村劳动力仍有3.6亿，完全不能得出中国剩余农村劳动力已经吸收完的结论。⁴

经过十多年的争论，尽管学术界依旧观点不一，但政策领域已明显地支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财办副主任韩俊2016年表示，这一争论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了。⁵争论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刘易斯拐点的概念理解不同；二是不同数据来源得出的结论不同。下面遵照刘易斯最原始的定义（即市场不能再以不变工资雇佣到所需劳动力，而非劳动力绝对数量供给不足），并结合多源数据来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澄清。

从二元经济结构来看，新世纪以来（尤其2003年以来），农民工工资普遍上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出现“民工荒”，劳资冲突问题加剧。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企业很难再以不变工资雇佣到所需劳动力，涨薪压力日益增大，这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均预示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人口抚养比是衡量人口转变的核心指标。从图1可以看出，总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出现明显拐点。2010年之前的四十年，总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但在2010年达到35.59%的最低值之后迅速回升。尽管少儿抚养比在2010年后基本稳定，但老年抚养比在2010年之后呈现加速攀升态势（2050年为2010年的近4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已经式微。

从劳动力供给总量看，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就明显放缓，更为重

¹ 蔡昉，王美艳. 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10): 12 - 19.

² 王德文.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 [J]. 人口研究, 2009, (2): 32 - 35.

³ 钱文荣，谢长青. 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 [J]. 人口研究, 2009, (2): 37 - 40.

⁴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724/c40531-22307375.html>

⁵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218/15085462_0.shtml

要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 2014 年达到 1014.71 百万人之后开始下降。这进一步验证了旧的人口红利将一去不复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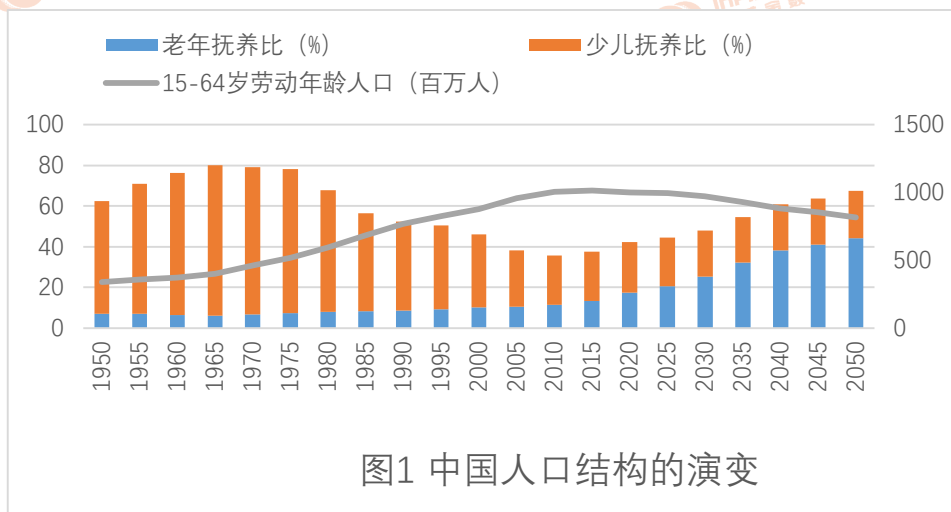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结构的演变

注：少儿抚养比=0-14岁人口/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2017)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https://esa.un.org/unpd/wpp/DataQuery/>

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挑战

人口红利的消失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挑战。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进行分析：一是与少儿人口有关的生育政策挑战；二是与劳动年龄人口有关的就业的挑战；三是与老年人口有关的未富先老的挑战。

（一）人口红利消失后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学界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以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易富贤为代表），将当今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格局完全归因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严格执行，但从图 1 可以看到，在 60 年代，中国的少儿抚养比就已经出现明显下降趋势。2011 年放开二孩之后，少儿抚养比依旧保持相对稳定水平，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期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也并未出现明显上升趋势。

世界范围的经验研究表明，生育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新加坡、韩国、泰国等国家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但这些国家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生育率与中国大陆一样都处于较高水平，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都降到更替水平之下。

中国生育政策的放开是循序渐进的，从 2011 年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到 2013 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再到 2015 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侯东民认为，在老龄化初期，匆忙的放宽乃至取消计划生育，它的结果只有一个，只能是加重中国的人口发展矛盾，本世纪下半叶才是大幅放开生育的时机。

易富贤和哈佛大学教授黄文政等人则认为，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甚至应鼓励生育。

笔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仅仅是当前人口结构格局的催化剂，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重要影响，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并不会导致生育率的报复性回升，在长期有利于更多劳动年龄人口的形成。尽管渐进改革是中国的一贯作风，笔者认为放开生育的政策可以力度更大一些。

（二）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意味着失业问题的消失

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因为当前的就业问题依旧比较严重。然而蔡昉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就业问题自然消失，相反，我们应该将注意力从关注失业总量转向失业结构，尤其是三大就业困难群体：农民工、大学生和城镇再就业人员。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一代农民工很少会务农，即便失业也不愿或无法回到农村，因而尤其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形成周期性失业，2009 年农民工提前返乡和 2010 年的民工荒就是例证。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自身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城镇再就业人员大多年龄较大、技能较低，摩擦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应针对这三类群体的失业特征，采取不同的措施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

（三）老龄化的关键是“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即中国老年抚养比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趋同速度。中国经济起步较晚，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36.8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同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却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6.9%）。

韩国、日本等国家也在近些年出现了较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其已经具备一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相对能够较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多的是“未富先老”的问题，即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缺口，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构成重大挑战。蔡昉（2011）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未富先老，一是实现向生产率驱动的模式转变，二是加快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变，三是适时调整生育政策。⁶

田雪原（2010）进一步指出，老龄化的挑战是全面的，不能以“未富”遮百丑，目前我国建立的是结构型养老保障体系，城市大都实行了老年退休金制度，农村大多数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

（四）金融市场喜忧参半

⁶ 蔡昉：《超越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8-39 页。

⁷ 田雪原：“未富先老”视角的人口老龄化，《南方人口》，2010，25（2）：13-17。

人口结构的转折性变化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负面影响看，劳动年龄人口是金融投资的主力，总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家庭支出负担增加，储蓄率下降，进而减少其金融投资数额；此外，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给实体经济增长带来较大挑战，这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

从正面影响看，人口老龄化会刺激养老金融的发展，给金融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此外，人口红利式微之后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有所削弱，进而可能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这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提供了空间。

三、人口红利式微之后的对策

人口红利式微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挑战，包括就业、增长、人口老龄化、金融等各方面。最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开发新人口红利

首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挖掘旧人口红利的潜力。尽管农业人口转变为农民工的潜力已经式微，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这些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潜力和消费潜力并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问题困难，农民工难以获得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农民工的市民身份和社会认同问题等等，这些都抑制了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潜力。

其次，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缓解养老压力并增加劳动供给。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65岁很难再作为老龄人口的划分标准，这些延长了的健康寿命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最后，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出生的人正好赶上了这一好的机会窗口。因此，尽管八零九零后大多为独生子女，使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但劳动力质量大幅提升，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源泉，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力。当前应继续扩大教育和培训资源，尤其是加强学校教育与企业技能需求之间的匹配，减少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

（二）创新提供发展新动能

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源泉：劳动、资本和技术创新。近四十年来中国依赖人口红利和高储蓄高投资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劳动和资本的潜力已经式微，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从过去依赖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到依赖技术创新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人口红利

式微倒逼发展战略转型，这也是党中央在新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中国经济开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势头指明方向。

（三）改善收入分配

刘易斯拐点的重要表现是工资的普遍上涨，这为收入分配的改善提供了契机。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先富带动后富，然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方针。如今，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为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九大报告更是为共同富裕设计了时间表。

收入分配的改善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在 2010 年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是一个大分化的阶段，收入分配的改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非常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发达国家；巴西、阿根廷、菲律宾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超过了 0.4 的国际警戒线，长期陷在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长期没有改善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⁸ 库兹涅茨曾经实证论证过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即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先不断恶化，然后慢慢改善。库兹涅茨拐点即收入分配开始改善的转折点，一般而言，这与刘易斯拐点在逻辑上是重合的。